

书评

# 拧紧官僚体制魔瓶之盖

——读米塞斯《官僚体制》



##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著  
冯克利 姚中秋 译  
新星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袁东

“官僚体制本身既不好也不坏。它是一种手段,可以被用于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有一个领域,即政府机构的管理,官僚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许多人视为罪恶的东西,并不是官僚体制,而是官僚领域的扩张。这种扩张,是日益限制公民个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动精神这一内在趋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是被称为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之父的米塞斯,针对官僚体制的种种问题,在1944年出版的《官僚主义》一书中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这位率真而长寿的经济学家,只要再多活一年,就可以看到其最优秀的学生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经济学的同时,也担任着维也纳商业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直到1940年被迫移民美国。在美国不到4年,就有关于美国与欧洲政治经济生活的差别,特别是官僚管理领域的不同。源于这种差异感,结合长期以来人们对官僚的各种负面看法,以及当时中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写出版了《官僚体制》一书。

今天,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关键阶段的中国,再来谈半个多世纪前米塞斯的这本书,仍然有着切实的共鸣与认同感。

人们总是在避免官僚主义与

体制,指责官僚管理,特别是那些处于行政序列运转中的真正官僚,也是惟恐避“官僚”一词于不及。然而,官僚问题总是实实在在围绕着我们,而且有增无减。这种现象从人类社会有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就存在了。只不过,由于政府有着是否“民主”“民有”之别,因而在不同性质的政府时代里,有关官僚问题的体现方式与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米塞斯看来,人类社会框架内的事务处理方式,或者和平的合作方式,不外乎是官僚体制的管理和利润管理。要想对官僚问题有个较为清晰的分析,也只能在同利润管理的比较中进行。

也正是在这种比较分析中,米塞斯得出结论认为,不同于受利润动机驱动的利润管理的是,官僚管理是一种运用于行政事务的手段,其结果不具有市场上的现金价值或者价格。因而官僚体制是一种行政技术与组织原则,其运行以执行既定的规则和条例为目的,官僚管理以必须服从上级机构制定的规则和条例为根本特征,官僚的任务则是履行由规则或条例命令而去其做的事情,不能有超出法律、规则规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说被实践证明政府是必要合理的,那么,这样一种技术与组织手段确实是政府行使法定必要职能所必需的,这套体制可以将政府活动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所以,米塞斯才讲官僚体制“既不好也不坏”。

但是,当这一手段被用在非行政领域里,跨越被严格限定的边界时,情况可就不同了。比如,在私人市场领域,如若官僚体制的管理肆意横行,结果就只能使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再受利润动机的驱动,失去了核算原则。最终,企业再也没有创新的激励与原动力,人们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极度短缺,社会活力丧失殆尽。这样的情形,我们太熟悉了。

无疑,在中国近三十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官僚领域在萎缩,原本由其占据的领域逐步让位于利润管理。然而,就目前与今后的发展要求看,这一进程不仅远远不够,而且多有反复,充满艰难。因为,我们看到以下现象不但没有消退,反而在加强。

比如,市场经济社会下的行政机构,应该受到法律与预算的严格约束,但目前的行政部门在随意解

释法律的幌子下可以有法不依,不受法律约束的行政现象在我们这个社会并不令人惊奇;何况,根除由行政部门代为草拟法律而起实质立法作用的体制,尚有较长的路要走。财政预算涵盖不全,尤其巨额年度土地出让收入均未列入各级政府政府的“预算内”;巨额国家预算调整行为时有发生,预算控制较弱。如果“民主”的控制是预算的控制,那么,建设“民主控制”机制的任务并不轻松。这两类现象说明,当前真正适用官僚体制的行政领域,离米塞斯意义上的真正官僚体制与官僚管理原则还有距离,或者说,并没有在行政领域里完全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要求的官僚体制,行政人员仍握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被实施的结果,就体现为种种具有侵害性的随意性行政行为。

还有,数量并不少的私人企业也越来越染上了“官僚化”。其典型体现是,经营活动与利润水平高度依赖官僚机构,主动或者被动接纳官僚及其相关人员为企业的高层或中下层工作人员,经营管理者相当一部分精力并不是放在基于消费者利益认可的产品与服务生产提供上。按米塞斯的观点,如果私人企业没有以创造利润为唯一目的,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僚管理的牺牲品,但导致这一“官僚化”的并非私人企业本身,而恰恰是行政力量对价格、生产的干预管制。如果官僚管理被严格限制在行政领域,没有政府对工商事务的不应有干预,私人企业就不会从基于消费者认可前提下的利润管理轨道滑向“官僚化”。

再有,以“加强监管”为名,伴随着“试点单位确定”、“额度分配”、“产品或服务审批、检查、重大事件处理”等措施,官僚管理在我国某些方面出现了再行扩张的迹象。这不仅使政府管制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而且像米塞斯所总结的,更压制私人主动创新精神,破坏着市场竞争,损害着市场效率。

从米塞斯对他那个时代东西方官僚体制的研究中,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在当今的中国,官僚体制建设与严格限制官僚领域扩张,是两个看似矛盾实则迫切的任务。前者要求尽快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行政体制;后者要求放松甚至取消管制,将官僚体制严格限制在政府行政领域这个魔瓶里,拧紧瓶盖,防止官僚管理从这一魔瓶里飘出来造成危害。



# 一切奠基于“五月花公约”

陆伟飞

翻看任何一个古老国家的历史,几乎都经历了神话、传说和信史这几个阶段。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地,但这并非中国的开端。中国人的民族记忆,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这便是传说。一直到汤、武革命,仍然是传说,口口相传而已。我们的信史,是从周召共和开始的,即公元前841年,我国历史算是有了确切纪年。犹太人的历史观念也很早,从上帝创造万物开始到诺亚方舟,再到摩西,内容十分丰富,是神话是传说难以分辨。从这些古老国家的历史观念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我们”的存在,这是一种民族意识。这是因为从有记忆开始,他们便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从来不会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要结成群体。

而美国却是例外。现在通行的世界史是否认印第安人对美洲拥有主权的。对欧洲殖民者来说,新大陆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1620年11月11日,从英国普利茅斯驶来的“五月花号”帆船落脚麻萨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踏上新大陆的41人各怀理想,但归纳起来不外乎致富和宗教自由两点。这是在其他地方很难观察到的一个社会的初始状态。“五月花号”仅存的41名成年男子一起商定了今后共同遵守的自治纲领,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公约称: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基督教信仰和荣誉的增进,我们漂洋过海,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结盟:同心协力为较佳秩序与生存建立一个文明政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要随时制定、拟定和设计那种公认最合适殖民地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条例、法令、法规以及设立治理机构。我们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一个社会及政治共同体由此诞生。在公约上签字,就表明当事人加入了这个共同体。因此,也可以说美国的历史是从个体的联合中开始的。而古老国家是逐渐演化而来的,个体绝无加入某共同体一说,因此也就没有产生社会契约概念的可能和必要。

其实“五月花号”并非首批开始在北美大陆拓殖的欧洲人,它之所以被认定为美国之始,就是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五月花公约”。而早在1606年,詹姆斯一世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一群由伦敦商人组建的弗吉尼亚公司。该特许状宣布,公司的目标就是帮助打造英格兰商业舰队,在贸易拓展中大力培养有能力的海员,寻找贵金属,在收到西班牙人威胁的土地上建立新教殖民地,并劝说异教徒皈依新教。当年12月,弗吉尼亚公司招募了105名各色冒险者登上三艘帆船,历经千辛万苦于1607年4月26日抵达切撒皮克湾。这便是北美第一个州——弗吉尼亚的开端。所以从一开始,殖民北美就是一种商业行为。

约翰·戈登前几年因一本《伟大的博弈》而名声大噪,随后又推出《资本的冒险》。这本《财富的帝国》是他资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如果说前两部算美国的专业史,那么《财富的帝国》就是一部美国经济通史。初到大陆,第一批殖民者差点



## 《财富的帝国》

(美)约翰·S·戈登 著  
董宣坤 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6月出版

难以立足,没有了世袭的权力,也没有了祖上的荫福,是穷是富,全凭自己奋斗。西班牙在拉美挖到大银矿发了大财,北美却没有这么幸运。后来才在市场的缝隙中找到了烟草蔗糖这两种经济作物,算是挽救了殖民地经济。但不易的成功往往比唾手可得更加有价值,因为个人的奋斗才是持久获得财富的源泉。而银矿挖完了,人的创造力也差不多已经枯竭。

读《财富的帝国》,你就会强烈感受到,美国的经济史,是由一个一个个财富故事编织而成的。循着时间线索前进,一个个财富英雄迎面而来。美利坚立国,也确实赶上了好时候。等十三个殖民地初具规模,社会相对成型的时候,欧洲的工业革命爆发了,并很快传播到了新大陆。第一艘蒸汽船是在美国试航成功并投入运营的,发明英雄是富尔顿,一名天才机械师和精明商人。更加波澜壮阔的故事则发生在电报、铁路、钢铁、石油、电力、汽车、金融等领域,各行业都涌现了大亨巨头,他们所创立的公司,至今仍在影响美国甚至世界经济。

中国传统社会瓦解后,政治便无法再吸纳多数社会精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历经曲折的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了,财富英雄也接踵而来,沈阳北大营的枪声、卢沟桥的炮火,让这个进程被迫中断。1949年之后,经济集权,一切都围绕政治运转,个人生产难以释放。财富甚至成了不名誉的东西,人们唯恐躲之不及。改革之初,每个人的口袋都空空如也,迟疑不决,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再次多了起来。到如今,第一批财富英雄即将功成身退。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奋斗不息的民族,人地矛盾迫使我们的先人勤劳耕作,这个基因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事实证明,只有解放个人生产,整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蒸蒸日上。美国的故事,就是绝好的例子。不过美国毕竟年轻,历史比较单纯,政治被法律牢牢约束,我们现在就有点复杂,法治不健全,腐败、过度投机似正在吞噬国民财富,也腐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建设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能让每个人都看得到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还有漫长的崎岖之路在前边。

## ■新书过眼

### 《动荡》

中国股市高端访谈录

2007年的中国股市牛气冲天,惊心动魄。在“全民炒股”的喧嚣之中,老股民发现经验正在失效,屡屡踏空,新股民发现牛市并非万能,陷阱重重。为求破解股市迷局,从“2·27”暴跌开始,在约半年的时间里,和讯网持续推出中国股市高端访谈。在前后二十余次访谈中,巴曙松、左小蕾、谢百三、华生、陈德武等各方知名人物分别从各自的专业视角解读今年中国股市大震荡的成因,预测未来中国股市的走势。虽然在股市的许多问题上,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但这些声音至少展示了中国股市的某个层面,反映了各位专家的思考深度,而这些话题,可以说都跟今天的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究竟中国当下有怎样的资产泡沫?该如何防范中国经济的风险?牛市还能走多远?怎样加速推动股市的生态多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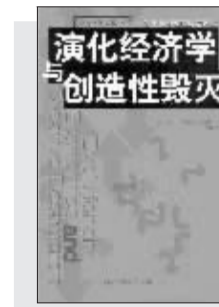


和讯网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10月出版  
北京世纪文景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 《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

J·斯坦利·梅特卡夫是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从事创新与竞争研究的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ESRC)的主任。本书是他在一年一度的格拉兹·熊彼得讲座的学术讲演,探讨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步形成的演化经济学思潮。这个思潮试图从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中突围,为整个经济学的发展重新定向。

梅特卡夫的讲演将竞争视为一个演化过程,通过将经济行为间的差异与市场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角色相联系,提出了对竞争过程本质的全新认识:创新是企业行为差异的主要来源,竞争的驱动力是创新,竞争性条件的可持续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的扩散和进入,而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失灵则是市场经济中知识生产和扩散过程不可分割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政府技术政策的任务不是预测哪种创新将会胜出,而应当是构建一个基础设施来支持企业,促进创新多样性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使创新的涌现更为容易。



(英)梅特卡夫 著  
冯健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出版

### 《当代社会契约论》

这本文集收集了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一个主要来源的社会契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社会契约论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标志性概念,也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设想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建构自由主义的社会的理论重要理论基础。近代政治哲学大师们纷纷诉诸这一概念说明国家的起源及其合法性。20世纪中期,西方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罗尔斯又一次启用这一思考模式,使它进一步成为整个公共世界的规范体系的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法。此后,当代政治学中各种新的“契约理解”样式接连不断问世,有的反对罗尔斯的理论,有的从新的角度诠释罗尔斯。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契约论的核心思想也被一些理论家用来构造一种独特的规范伦理学理论,这些大大深化了我们对规范的政治理论与道德哲学的关系的理解,也让我们了解西方知识分子究竟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对于哲学和政治的影响。



包利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9月出版

### 《幸福的方法》

泰勒博士专门从事个人和组织机构的优势开发以及提升领导力的研究已经10年了。他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积极心理学”、“领袖心理学”两门课程,被哈佛学生们分别推选为最受欢迎排名第一和第三的课程,一举超越了由著名经济学家曼昆教授讲授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人生导师”。他的“积极心理学”打破了传统心理学只关注失败和障碍的旧模式,它并不针对“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关注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它告诉人们,幸福并非可望不可及,“幸福”可以通过练习后养成“习惯”。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以牺牲自身幸福换来的成功往往脆弱而不长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真实的自己,只有悦纳了自己,才能悦纳别人。别以为不断努力、不断超越,心灵就会得到成长,心灵的成长靠得是减法而不是加法。本书将积极心理学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和传统智慧精华呈现给读者,期待与大家分享终生提升幸福感的方法。



HAPPIER  
泰勒·本·沙哈尔 博士编著  
Tal Ben-Shahar PhD 著  
汪冰 刘骏杰 译  
汪冰 审核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年10月出版

# “买空卖空”的市场特殊功能

朱剑平 郑义

放眼国外市场,证券信用交易和股市几乎是孪生兄弟。它和自有资金的交易一样,同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功能。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初创之时,一方面是由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不可避免地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证券信用交易即融资融券一直是三令五申严禁的非法行为。这也难怪,试想,连股市姓社姓资还在争论不休,带有明显的“旧社会”痕迹的“买空卖空”怎么会允许呢?可是,在商业社会中,由于财务杠杆的存在,融资行为是不可能被禁止的,没有合法的方式,就会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于是地下金融大行其道。向客户透支、三方监管、券商委托理财、非法国债回购等,不就是前些年极为流行的非法证券信用交易的存在形式吗?其结果是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一度出现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些大券商因此垮台。

去年7月,中国证监会颁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它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是,自此融资融券业务在中国完全合法化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何尝不是一种痛定思痛的结果?

鉴于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券商的研究机构中,对信用交易的研究素来滞后。算起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研究员于华、陈建瑜,以及来自券商的研究人员庄虞华、蒋健蓉等都是较早从事这

个领域研究的。原南方证券的高翔、李苗子等主编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研究》是较早的关于融资融券方面的专著。但这些研究和著述都还着眼于对境外市场的研究,然后对我国融资融券的业务框架提出设想和建议。这在我国融资融券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新《证券法》实施后,尤其是《管理办法》出台后,客观形势迫切需要对国内现实条件下的融资融券业务有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

现在,孙国茂拿出了专著《中国证券市场信用交易研究》,在研究境外市场信用交易的历史和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融资融券从制度建设到业务模式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评价和建议。可以说在国内证券理论界留下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印记。更难能可贵的是,孙著对《管理办法》的很多不足之处还有前瞻性的探讨。确实,融资融券在理论上还有很多有待研究和完善之处,如券商的转融通问题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仍然是空白,这意味着即使将来推出融资融券业务,券商的转融通业务还是无法开展。而在国外证券市场上,转融通是融资融券整个业务环节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作者对此都有独到见解。

孙国茂在证券行业的从业经历超过15年,其中在天同证券有10年,亲身经历了天同证券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对该公司因非法信用交易而垮台的经历有切身体会,从另一层意义上说,这对他从理论



## 《中国证券市场信用交易研究》

孙国茂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年10月出版

上深入思考如何在制度完善的条件下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正因为券商对证券保证金的三方存管制度的消极态度,《管理办法》颁布一年多,可融资融券业务的实际开展却处于停滞状态,目前还没有一家券商获得此项资格。但是,自今年上半年以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监管层的协调下,券商和银行的合作越来越顺利,第三方存管的进程明显加快。从目前已披露的信息看,所有正常经营的100家券商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工作将在年内完成,融资融券的最后一个障碍即将消除,预计融资融券业务有望年内正式启动。这本书此时问世,正其时也。